学习与交流

第 8 期

（总第210期）

中共宁夏区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5年5月12日

【内容提要】

- 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
- 回望传统——读《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

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

陈　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 24 个字包含着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来有自，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精神层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有着深刻而紧密的联系。

——作者

国家层面的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特点。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大多奉行“以神为本”，而中国最早从“以神为本”的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到了西周前期，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那时“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是，人事比神事更重要。这个思想一直影响到近代。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就是发挥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也形成了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价值观。“以德为本”，就是主张以德治国，强调道德重于法律。在《孟子》中，管理社会、与人打交道以及从政有两个原则是互相对立的，一是“以德服人”，一是“以力服人”。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我们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也有一个“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问题。由此，孟子把“以德服人”称为“王道”，“以力服人”称为“霸道”。

“以民为本”，在儒家以前已开始酝酿。《尚书》里有“民为邦本”的观念，“邦”就是国；这个观念甚至可以反映在某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代表最高的神，但是这个神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视听为视听。后来，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明显

地强调了人民尊于君主、重于君主、高于君主，我们以前习惯把它叫做“民本思想”，也即是“以民为本”。

“以合为上”，或者“以合为本”，这个“合”不是和谐的和，是合作的合、合一的合。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处理民族、国家这类事务时，强调合一高于分立。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里，在管理国家时这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从上到下都以合为高、为尊、为贵，不赞成分立。

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表达，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高于万物，“以德为本”强调道德重于法律，“以民为本”强调人民重于君主，“以合为上”强调合一高于分立。

社会层面的价值观

社会层面包含四个层次：第一，责任先于自由；第二，义务先于权利；第三，群体高于个人；第四，和谐高于冲突。

从孟子开始，“士”的责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中国古代的“士”文化里非常强调责任的意识，强调人对整个家、国、天下所负的责任。责任先于自由的这种意识成为我们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

如果把近代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对照来看中国古代价值观，义务先于权利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新儒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最讲义务，义务是先于权利的；而近代西方人则主张个人的权利是优先的。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更多的是伦理的社会，比如父母和子女，只能说父母有养

育子女的义务，子女不能有要求父母养育的权利。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性格，就是义务重于权利，义务先于权利。

中国传统文化里，处理群体和个人关系的时候，也一定是群体本位立场。西方一直到了16世纪以后，“以神为本”才开始被取代，强调“以人为本”，但从主体上来讲还是强调以“个人为本”。而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在群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群体为本”。在中国古代，群体有不同的层次，可以被无限地放大。从个人推演出去就是，家庭、家族、宗族；更进一步，社稷、国家、天下。因为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很早就提出了“天下大同”。

儒家、道家崇尚的和谐观念，早在中国上古文化里便已萌芽。春秋时期《国语》里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尚书》里很早就提出“协和万邦”、世界和平的观念;《左传》里也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就像乐器演奏音乐的那种和谐一样，要达到天下的“无所不谐”。所以，和谐的观念应该说在我们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把音乐的和谐作为一种模式和典范，把它推广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甚至推广为宇宙的和谐。60年前，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现代外交的运用。

个人层面的价值观

首先是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孔子提出“义以为上”，荀

子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开篇就是“何必曰利”，都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

其次是以理制欲。理就是道理的理，欲就是欲望的欲。《荀子》里讲“以道治欲”，道和理是相通的，不能任由欲望自己发展，一定要有个统帅。这个统帅一定是理性，一定是道理，就是道德法则、道德原则。

中华文化传统里有大公无私的观念。《尚书》里已经有以公去私的讲法，宋明理学认为私是可以有的，但是私的上面一定有个东西就是公，并且强调这个私必须由公去主导、去把握。这个原则对于传统士大夫非常重要，一个士人出来做官，一定会碰到公私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以公胜私，公心胜于私心。

心胜于物，就是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生命的需要也是一种物质需要，很重要，但是精神的需要更重要，所以是舍生取义。涉及生死的问题，从孔子到孟子都表达了人格的尊严、人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比仅仅生命的保存还重要。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表示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更重要。

基本道德也是社会价值

价值观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行为的直接指导。中国古代提出的这些基本道德，既是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同时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

最明显的例子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少从汉代以来就成为我们的五项基本道德。从个人道德来讲，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

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这是作为个人价值、个人道德的意义。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仁义礼智也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比如《贞观政要》里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仁、义，在这里，仁、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基本道德，也是国家治理首要的原则。比如说社会层面，仁就是仁政惠民，义就是社会正义，礼更多的是强调文化秩序，和是和谐团结。再比如，仁不仅仅是做人要厚道，仁者爱人有更大的层面，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所以仁义礼智在古代不仅作为个人道德的基本观念，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今天在讲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的时候，要兼顾这几个方面，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掌握。

最后，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简单重复，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为根基、为基础的。只有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是从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里面发展出来的，才能够完成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完成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担负的责任，传承、发扬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回望传统

——读《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

张广昭

近来，《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一书持续热销。这本书以修身、为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分篇，遵循了中国古典治理哲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进阶，可说是对古典的一次致敬；同时结合当下时政社会现实，对100余条古典治理名句一一释义，挖掘其现代价值，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本书热销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关切，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传统治理智慧的一次回望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平天下》正是从“通古今”着手，探索传统文化底蕴，提炼和汲取蕴含其中的当代精神和现代价值，对传统思想尤其是传统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笔者看来，中国古典治理思想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智慧的力量，无论是对国内治理还是国际治理，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一是国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遗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中，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格外引人注目。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讨治国安邦的问题。在古老文献《尚书》中，已有大量关于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治理国家。在治国、安民、法治、吏治、修养等方面存在很多传统思想，可为咨政之用。

治国安民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天下百姓的关系问题，即“公天下”还是“家天下”的问题。《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生动注释了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 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肯定了“公平正义”，否定了“家天下”现象。二是如何看待贫富、分配问题。《论语》中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经世文编》中提到“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万民焉。所谓均者，至公无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谓也，非曰夺彼以益此也”，说明古代就很清楚“均富”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的一大方面，就是要让改革开放成果人人得以分享，破除利益集团的设租、寻租、护租行为，实现全面小康。三是如何看待民心、民众信任问题。《孟子》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题，《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论语》中指出“民无信不立”，都在阐释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与我党一直强调的“人民是权力之源”“为人民执政”具有一致性。四是如何看待治乱兴衰问题。“安而不忘危”、“壅蔽伤国”、“乱之本鲜不成于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清谈误国”等，都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法治方面，古代大量法治治理思想的论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基础和历史积淀。“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都为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滋养。

吏治方面，一些传统吏治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有益借鉴。吏治，即官吏治员的行为、风气和绩效。吏治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绩效。“圣人治吏不治民”、“养民之道，省官为先”、“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等传统吏治精华，就告诉我们，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简政放权，公正无私处理政务。反面的如“朋党兴，则人心国是如乱丝”“朋党之兴，国之大患”等，说明了朋党误国、污染政治生态的危害性，颇有借鉴意义。

修养方面，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论语》有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贞观政要》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密切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修身为其基础和出发点。这与当前中国区别于西方的“贤人政治”一脉相承，具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二是国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理解“道路自主权”、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提供有 益启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等都在阐释一个道理，即“求同存异”哲学。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一些方面与世界各国是相通的，但在另一方面，因为独特的历史文化，

独特的国情民情，必然有所不同。换言之，中国等后发展国家不必唯西方模式制度马首是瞻，奉为圭臬，而应有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和权利。这就涉及一个“道路自主权”问题。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寻求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一个民族为了实现现代化，首先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加以抛弃，完全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注定失败。不仅是“求同存异”的政治哲学，中国传统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对调整国际关系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只重视人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使人单向度发展。事实确然，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失衡，突出表现在人的物化和异化。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中庸之道和重视家庭、重视自我修养的文化，有助于调节个人的心理平衡和内心安顿。

值得一提的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仁”概念的重新取向，有助于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结尾处强调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与儒家强调“仁”作为个人道德自主性的意义相通。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经过转化、改造，可能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乐意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不仅对我国现代化意义重大，对世界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阐旧邦以辅新命”。时代越是进步，我们越需要时时回望传统，从传统经验和智慧中反身自恭，推陈出新，为我们这个时代和生民“立心”“立命”。就这点来说，《平天下》虽然只是一本小小的读本，但对处于困顿中的社会精神来说，善莫大焉。

报：中央组织部，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党组

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发：各市、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组织部，区党委各部委、区直各厅局委办干部（人事处），各人民团体、直属事业单位组织部（人事处），各大中型企业党委组织部（办公室）

本刊所刊发文章同时在宁夏党建网刊登　　投稿邮箱：nxzzbbgs@163.com

（共印60份）